中医典籍外译的“大翻译”路径探索

——以《本草纲目》的两次西方译介热潮为例

陈水平[1,2]　杨运姣[1,2]

(1. 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2. 南方医科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健康中国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515)

摘　要:任何知识的流动都有翻译的在场,从跨学科角度对原文进行语际/符际的分析、阐释、改写、改编、重写和引用构成了知识传译的多种方式。《本草纲目》所经历的两次译介热潮实质上是西方博物学家与药理学家从跨学科视角所做的多模态、多层次知识传译,它超越了“语言中心主义”的范式,一方面回应了“大翻译”的概念,同时也给中医药典籍翻译的传统模式提出了启示——超越“狭隘”的、“忠实”的以本为本的文本翻译,聚焦更大格局与层面上进行的集体性、协约性的多符号跨学科的翻译行为。

关键词:《本草纲目》;译介热潮;大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1-0132-08

0　引言

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曾提出“要使更多古代中医典籍进入《世界记忆名录》,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①目前,我国共有两部中医药典籍《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被选入了《世界记忆名录》,但就海外的传播效度和影响力度而言,《本草纲目》显然远超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其他中医药典籍,其前后共经历了两次译介热潮,从出版伊始就受到诸多海外学者的关注。当然,造成二者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程度大不相同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从表面上来看,《本草纲目》无论从编辑体例还是内容,以及自身分类的标准,都更接近西方的自然科学,因而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所接受。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的两次西方译介热潮

收稿日期:2024-11-01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19-20 世纪在粤传教士医学译介活动研究”(GD21CWY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水平,女,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南方医科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健康中国与中西药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杨运姣,女,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方医科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健康中国与中西药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与典籍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陈水平,杨运姣. 中医典籍外译的“大翻译”路径探索——以《本草纲目》的两次西方译介热潮为例[J]. 外国语文,2025(1):132-139.

①参见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26/content_5046678.htm

一直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以语言和文本为中心的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而是一种多模态、多层次、跨学科视角下的知识传播。这种知识传播的模式回应了罗选民(2024)提出的“大翻译”概念——以文化记忆为引擎,以传播为目的,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对一种文化的经典翻译进行持续的、动态的、超越性的多模态互文阐释与形象建构。因此,本文将具体梳理《本草纲目》的两次跨学科译介热潮,并以此探索“大翻译”对中医典籍的经典化和全球化的意义。

1　从中药学到博物学的“大翻译”热潮

博物学是西方人近代在中国致力最多的科学研究。18—19 世纪,随着西方博物学风潮的兴起,中国大量研究植物、动物和矿产的著述引起了欧洲博物学家们的关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本草纲目》。据统计,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 250 年间,欧洲学者论述《本草纲目》的专著达 30 多种(潘吉星,1983)。这是中医药典籍《本草纲目》在东学西渐史上的第一次译介和传播热潮。由于中西方语言的阻隔,“翻译”毋庸置疑地为西方博物学家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去获取和研究《本草纲目》中有关大自然的知识。整个过程涉及几种形式——对中国自然知识的译介、辨识、挖掘、引用和利用,这些形式虽不全是“语言”层面的翻译,却构成了实质上的“大翻译”行为。

首先,《本草纲目》出版后就有不少西方自然科学家对其进行节译和译介。1735 年,杜赫德(du Halde)出版了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其中第三卷就是《本草纲目》第一个公开出版的欧洲节译本。1736—1738 年间,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又被译成英文,有“瓦茨(John Watts)版”和“凯夫(Edward Cave)版”两种版本。杜赫德的译作意义之重大,范发迪(2018: 137)曾说:“(它)是中国动植物信息的主要宝库,为几代欧洲博物学家所仰赖。”此外,美国汉学家、外交家卫三畏(S. W. Williams)1839 年为《中国丛报》撰写的《生物观察》(Notice of Natural History)的系列文章,其主要内容就是对《本草纲目》的译介。之所以选择《本草纲目》,卫三畏(Williams, 1838:45)做了说明:“在收集以下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利用了能够提供相关知识的所有中国著作。我们所见到的,在中国自然史方面最好的书,当属《本草纲目》。”由此可见,此次翻译热潮主要是从博物学的跨学科角度进行的。

对于欧洲博物学家们来说,由于中国传统知识中没有一套像现代植物学拉丁文那样可以共享的术语,因此博物学家还必须对《本草纲目》进行仔细的爬梳、对比和辨识。早在 1732 年,法国医生范德蒙德(J. F. Vandermonde)在澳门附近得到《本草纲目》,按书中所载药物及图片采集了 80 种矿物标本,并据原作所述,对每种标本作了说明和标签,并保留了其汉语名称,这是通过实物考察的科学方法对《本草纲目》的自然知识所作的辨识和多模态传译。事实上,由于当时的中国政治现实和制度约束,传教士并不能自由出入内地,因此

文本证据、历史资料再加上偶得的实物标本成为欧洲博物学家研究中国自然知识的重要途径。比如贝勒(E. V. Bretschneider)、谭训(Theophilus Sampson)和其他学者曾对多种中国植物进行鉴定,他们通过考证包括《本草纲目》在内的许多中文文献来确定它们是外来的、已归化的,还是本土的品种。1878 年,福威勒(Fauvel)在其论文《中国鳄鱼》(*Alligators in China*)中证明中国古代文献中常出现的“鼍”和“土龙”就是鳄鱼,并提出了一个动物学的新发现。福威勒(Fauvel,1878)长篇引用和翻译了《本草纲目》中有关“鼍龙”的描述,认为其跟西方学者有关鳄鱼的描述基本一致,首次证明了中国也有鳄鱼存在。一条在《本草纲目》中皮、肉、脂、肝俱有药用价值的鼍龙成为动物学定义下的中国短吻鳄。这种涉及多模态的跨学科知识重组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对有用的知识片段的筛选和利用,更是对知识进行跨学科传播,是“大翻译”的有效形式之一。

总而言之,我国中医药典籍《本草纲目》是 18—19 世纪来华汉学家和博物学家研究的重点之一。1881 年,俄籍学者贝勒发表《早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本草学的研究》一书,回顾了 16 世纪以来欧洲学者本草研究史以及中国本草学对欧洲的影响。他在《中国植物志》(*Batanicum Sinicum*)一书中评价《本草纲目》为“中国本草学名著”,李时珍“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古今的代表人物”(Bretschneider, 1882: 54)。科学史家李约瑟(Needham, 1954: 147)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第一卷导论中评价李时珍:“无疑,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独创性的分类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和精细的药物分类法之一,不仅早于林奈,且为林奈提供了借鉴(徐维廉 等,1989)。潘吉星(1993: 65)考证了达尔文三部进化论著作中约 100 处中文资料的来源,发现《本草纲目》是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达尔文(1984:416)称《本草纲目》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范发迪(2018:149)也指出,《本草纲目》是西方博物学者最常引用的中文著作,而且即使在 19 世纪,它也一直是研究中国博物学的学者必备的教科书。

2 从中药学到药理学的“大翻译”热潮

除了挖掘和研究中国的动植物以及自然界材料知识,19 世纪的来华传教士还对中国的中药材以及草药治疗感到好奇,希望从中文文献中发掘与中药材相关的资料。不过,与博物学家不同,药学家们一般聚焦于中药和方剂,采取分析化学和实验科学的手段来研究和传译中国本草学知识。这种发掘是与西方药学的跨学科对比研究中,通过对中草药进行不断地辨识、正名、分类以及成分分析的过程中展开的。用西方描述药理的成分说来阐释中医药的药性说,这种知识的传译既是跨符号,也是跨学科的“大翻译”实践。

1871 年,汉口的波特·史密斯医生(Porter Smith)在研究《本草纲目》等著作后,按图索骥,编著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药料品物略释》,先后在上海和欧洲出版,其目的是帮助在

华外国医生和医学生辨识草药,解决行医缺药的难题。波特针对当时西医中译出现的医学术语难题,尝试从本草切入,以中文、拉丁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对译的方式,开辟出一条翻译新路径,由他创建的这个术语对照方法奠定了中国医学术语编写的标准框架 ,一直沿用至今(高晞, 2015b)。1874 年,法国驻华领事铁桑(de Thiersant)与巴黎药学院教授雷诺(J. Léon Souberain)合作研究的《本草纲目》(*La Matiére Médicale chez les Chinois*)在巴黎出版。1876 年英国科学家韩伯里(Daniel Hanbury)出版专著《药物学与植物学论丛》(*Science Papers, chiefly Pharmacological and Botanical*),其中有一半内容专门讨论《本草纲目》。1886 年,福特(Charles Ford)与阿伯丁大学何启(Ho Kai)开始合作从事一项鉴定分析中国药物的研究。

20 世纪,随着基础医学的建立,西方人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多、更好、更行之有效的药物进行研究和应用,而中华博大精深的本草医药自然再次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付明明,2016:201)。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席文(N. Sivin)和库帕(W. C. Cooper)合作,发表题为《人身中之药物》(Man as a Medicine)的文章,列举人体产生的八种可入药的物质,并声称:“对本章讨论的人体中产生的八种物质,我们要根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明其制品及应用,这部书仍然是传统医生的千部标准参考书之一。”(Cooper et al. ,1973: 211)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伊博恩(B. H. Read)自 1909 年来华以来,35 年如一日编译中医药物学著作,开展药理分析研究,对《本草纲目》等诸多中医药典籍中提到的许多药物比如麻黄、苦杏仁、治疗夜盲症的诸多药物进行科学实验,发表了大量文章。1935 年纪育澧、伊博恩(1935)发表的文章之一《我国食物及药物中维他命 C 之含量》,就用实验证明《本草纲目》所记载六种可医牙痛及痢疾的苋菜中,绿苋菜的维生素 C 等同于柚子和辣椒,有抵抗坏血病之极佳功效。

20 世纪初,美国学者米尔斯(Ralph Mills)和他的朝鲜同事开始致力于翻译《本草纲目》,最终译成稿本 40 余册,后因故中断。1920 年,米尔斯将稿本和药物标本移交给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药学系主任伊博恩,后者接着翻译了《本草纲目》中金石、兽、禽、鳞、介、虫和鱼七个部分。伊博恩(1939:4)曾说明他的翻译意图:“现代新医学以动物为最重要之药物,近 20 年来即以激素、维生素、组织浸出质三种成绩及化学之经验,已提醒动物之疗学,因此余所译《本草纲目》中兽禽鳞介四种,于现代新医学甚为需要。”伊博恩正是用化学成分分析和实验科学的方法来传译《本草纲目》,他给每种药都标明了中文原名和学名,并附以插图。这种跨越符号的认知上的重新阐释和评价也促成了知识超越文本的流动和传译。

3　“大翻译”对中医典籍外译的启示

《本草纲目》的跨文化传播离不开翻译,但纵观中医药典籍《本草纲目》的两次译介热潮,这种翻译又并非“语言中心主义”的传统文本翻译实践。我们不能否认《本草纲目》这

种跨学科多模态知识传译的意义,它虽然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全译本[①],但是相关知识依然通过各种碎片化的挖掘、分析、阐释和引用得到了传播,而且这些分散的碎片之间最终产生了一种历时与共时并重,一种翻译与阐述共生的互动,合力为《本草纲目》建构了一种更为世界性的集体文化记忆,也给中医药典籍翻译的传统模式带来了新的启示。

3.1 超越“忠实”的翻译标准

一切知识都与一定的文化环境、社会结构和民族利益相关联,因此知识首先是地方性的。在中国,“博物”之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最早的辞书《尔雅》,但中国古代“博物”一词并非西方的博物学,它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门类,而是与古代“通识”(广博的知识结构)教育相联系的一种观念。例如,晋代的张华著有《博物志》一书,直接取“博物”二字为名,希望“博物之士,览而鉴焉”尽管中医药典籍《本草纲目》传承了中国博物的传统,但与西方博物学实属完全不同的两个知识体系。西方博物学传统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布丰、林奈、达尔文等人。18 世纪,林奈(Carl Linnaeus)创建了新分类体系与双名法,从此西方有了一套高度标准化的词语来描述标本可以观察到的特征。

“忠实”的翻译的确是让“地方性”知识得到准确无误传达的前提,但如果要让全世界接受“地方性”知识,就不能只依靠“忠实”的翻译。中国博物传统与西方博物学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性让多数西方博物学家并不在意中国博物知识的整体框架,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鉴定个别植物和动物的实际问题上。中文文献被他们视为一种落后的、不成熟的、信息芜杂的资料来源,他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取珠于泥”——发掘、考证和翻译那些他们认为“科学”的材料。在这个传译过程中,西方博物学家显然预设了西方科学及其语言文化的内在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使他们自信地肢解中国的传统知识,以便从中获得他们认定的事实。

因此,知识的“地方性”让我们警觉科学帝国主义对其他民族知识断章取义的改写和挪用,但这种警觉不是要让我们用民族主义视角重新去反写,或者覆写一个更为“忠实”的译本,而是要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主动去进行多模态、多层次的“大翻译”活动,从而带给世界人民不一样的文化记忆,促成“边缘”文本或“边缘”文化的主流化、经典化和全球化。

3.2 拓展“以本为本”单一翻译模式

《本草纲目》的两次跨学科译介热潮都超越了“以本为本”的语言中心主义,呈现出多模态的特点,参与其中的不仅有文字和图像,还有化学分子式、植物标本等。

首先,西方博物学家对中国动植物的研究往往会借助语文学、地理学和史学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汉学家的分析比较和诠释,因而知识在传译的过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跨学

① 2003 年,中国学者罗希文教授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全英文译本,但鉴于该译本不属于西方译介《本草纲目》热潮之列,因此不包含在本研究之内。

科面貌。其次,博物图鉴、草药图鉴以及实物标本也加入到了整个博物知识的传译过程,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草纲目》本身就附有插图,在华博物学家们往往会按图索骥,采集和辨识这些植物和药物,比如上文提到的福威勒便是利用了《本草纲目》中“有点古怪但足以显示其特征的鼍龙图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再次,每每收集到一些新奇的鸟禽和花草,他们都习惯请人用绘画的方式将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这些基于西方写实主义的科学图鉴成为知识交流的媒体,不但浓缩了大量的信息,还传达了一种更为直接、精确的印象,比语言更有说服力。据记载,18 世纪末在华博物学家收集花草图画作为科学资料,或雇佣当地画工绘制标本已经是常见的做法(范发迪, 2018: 55)。

对于药学来说,中医解释药物的方法与西医也极为不同。《本草纲目》每个条目下列“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附方”等项,其中释名项,一般会从药物的形色气味、生境产地、月令、药性、功效主治,甚至从方言、音韵、语源方面全面研究药物的命名。比如,《本草纲目》(第三十五卷,明万历二十四年金陵胡承龙刻本)中“檀香”的释名项不但从语源来解释——“檀,善木也,故字从善也”,还一一列出药物别名和出处:“释氏呼为旃檀”“番人讹为真檀”“云南人呼紫檀为胜沉香,即赤檀也”。然而,西方药学强调的是成分说,从药理学角度来研究药品的化学分子式,并说明功能效果。这种分析化学和现代实验科学方法研究和阐释中药的范式,至今还应用在中药研究领域中。

从西医药理学及现代植物学和营养学角度,用英文描述总结中药的成分,一方面有助于破除中医在西方人眼中的迷信产物形象,一方面也使得建立在博物传统之上的中国本草医药学逐步向现代发展,形成了以传统的药性理论(通过分析药物形态、颜色、质地、生境等作为释药依据)与现代药理分析(以实证、实验科学为基础的对药物进行成分分析)相结合的新兴中药学。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用低温提炼有效成分与药理实验相结合等方法从青蒿中成功提取到了一种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这不是简单的成分提取,而是对中药学进行的跨学科多模态知识传译。

由于西方药学和中药学之间的地域和文化差异,这种自伊博恩起就被沿用至今的研究、阐释传统中医药的分析化学和现代实验科学方法饱受国内中医药专家的非议和质疑。但这依然是目前中医药知识能够在东西方进行有效传播和言说的唯一“符号”。因此,要打破这种科学帝国主义的偏见,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超越这唯一的传播“符号”,拓展多模态的知识传译模式。对于中医药典籍来说,一切与健康、医疗实践相关的互文阐释都可以成为促成知识传播的有效途径,正如针灸、拔罐和按摩在海外的传播模式一样,更多的是依靠非文本的临床实践。

3.3 强调“翻译”的历史延续性

一个文本的形成就是一个人某种记忆的凝结,这种记忆的凝结要获得巩固或延续,便

需依靠不同记忆的重复或不断阐释(付添爵, 2020)。因此,“大翻译”概念特别强调翻译的历史延续性,正如罗选民(2019)指出,唯有将文本的言语行为与它原来的场景分离,放在一个延续千百年的时空中去诠释、改写、翻译、升级,文化记忆的可持续性才成为可能。我们的中医文化正是通过集体文化记忆在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本草纲目》两次译介热潮所横跨的三个世纪里,得益于西方博物学家和药学家不断地对该书进行多模态、多层次、跨学科的阐释、分析和引用,从而让有关《本草纲目》的文化记忆通过社会各群体在其各自不同的符号象征、不同的媒体传播、机构运作和社会实践中得以反复运用和流传,最终构建起一种所有成员共享的记忆,让《本草纲目》的影响力在西方持续至今。

“大翻译的感官效果是马赛克式的,非远看而无法得其全景;是交响乐式的,一定要协调形成集体合力才能完成任务。”(罗选民,2019:99)对已有文本符号进行跨学科、多模态、多层次、不间断地重新回忆和解读是一种文化记忆最终得以沉淀和成型的过程,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部作品要成为经典,要被全球化传播,就需要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一代又一代地不断阐释、演绎,最终构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文化记忆。因此,中医典籍的对外译介就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壮举,它必须不断地寻找可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

《本草纲目》两次译介热潮都是借用了多模态的跨越学科的知识传译方法,对原文文本不断地进行语际/符际间的译介、阐释、分析、翻译、改写和引用,即使并非传统意义上具体且聚焦的文本翻译,却属于“大翻译”范畴。王宁(2009:209)指出“语言中心主义”仍然占据着翻译研究者的思维和写作模式。因此,“统观”下的“大翻译”概念将多模态、多层面、跨学科的语符转换与知识流动纳入其中,突出不同翻译形式之间的互动性、互生性和互文性,不但超越了以“语言为中心”“以本为本”的传统翻译研究范畴,势必还能拓宽中医典籍对外译介的传播途径,丰富其传播方式。

4 结语

“大翻译”与文化记忆相勾连,目的是要揭开“地方文化”经典化和全球化背后的秘密。中医典籍要获得经典化和全球化,就必须形成世界性的集体文化记忆。因此,建构中医典籍的“大翻译”格局不失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它不局限于经典文本的传播与翻译,而是借助多角色、多媒介、多模态、多层次、多实践的传播来形成共时和历时的合力。《本草纲目》的两次译介热潮也恰恰也证明了“大翻译”的意义——以跨学科比较研究为基础去实现知识的传译,超越“狭隘”的“忠实”的“以文本为本”的“语言中心主义”翻译传统,在更大格局的层面上进行集体性、协约性的翻译行为,让中医和西医在翻译中进行对话和交流,哪怕这种对话只是碎片式的、分散的,毕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参考文献：

Cooper, W. C. & N. Sivin. 1973. Man as a Medicine; Pharmacological and Ritual Aspects of Traditional Therapy Using Drugs Derived from the Human Boby[G]//*N. Sivin the Chinese Sc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retschneider, E. 1882. *Batanicum Sinicum* [M]. London: Trubner & Co.

Fauvel, A. A. 1878. Alligators in China[J].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 s. (13): 1-36.

Needham, Joseph. 1954.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1)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W. S. 1838. Notices of Natural History[J]. *Chinese Repository*(1): 45.

达尔文. 1984. 人类由来及性选择[M]. 北京:科学出版社.

范发迪. 2011.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付明明. 2016. 中医英译史梳理与存在问题研究[D]. 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付添爵. 2020. 大翻译:文化记忆与翻译研究的思想融合[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115-122.

高晞. 2015a. 地理大发现后的“中医西传”[J]. 文汇报:09-11(w10).

高晞. 2015b. 十五世纪以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J]. 中医药文化(6):15-24.

纪育澧,伊博恩. 1935. 我国食物及药物中维他命 C 之含量[J]. 杨群华,译. 1939. 新科学(1): 8-19.

李时珍. 1596. 本草纲目[M]. 明万历二十四年金陵胡承龙刻本:第三十五卷.

李约瑟. 1975.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第 1 分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

罗选民. 2019. 大翻译与文化记忆: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J]. 中国外语(9):95-102.

罗选民. 2024. 大翻译与文化记忆:融合与启示[J]. 外国语文(1):1-8.

潘吉星. 1983.《本草纲目》之东被西渐[J]. 药学通报(10):587-594.

潘吉星. 1993. 中外科学之交流[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王宁. 2009.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徐维廉,李志平. 1989.《本草纲目》学术评价之比较研究[J]. 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21-23.

伊博恩. 1939. 近十年中曾用科学方法试验者[J]. 中华医学杂志(1):3-14.

Exploring “Bi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A Case Study of Two Translation Booms of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in the West

CHEN Shuiping　YANG Yunjiao

Abstract: Where knowledge flows, translation follows. Analyzing, explaining, adapting, rewriting, and even citing the original text interlingually and inter-semioticall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lso serve as forms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two translation booms of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in western countries exemplify this phenomenon, representing multimodal and multilevel translations carried out by Western naturalists and pharmacologists. These efforts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language centrism” and align with the emerging concept of “big translation.”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lications of “bi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lassics in foreign languages. It argues for moving beyond a narrow focus on “faithful”, text-based translation and embracing the inter-semiot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collective and compromised significances.

Key words: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translation boom; big translation

责任编校:朱晓云